

抗战记忆 桂林抗战文化城名人录②

王鲁彦：不懈的战士 贫病交加中创办《文艺杂志》

□ 本报记者 周文琼



①



②



③

抱病创办《文艺杂志》——
成为桂林文艺园地里一朵灿烂的鲜花

抗战时期，桂林文化抗战轰轰烈烈，新闻、出版、文学、戏剧、音乐、美术等空前繁荣，王鲁彦从1938年冬到来至1944年逝世，期间虽有短暂离开桂林，但大多数的时间在桂林，他在桂林期间创办《文艺杂志》并以此为枪，在桂林城里文化抗日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王鲁彦从上海转到武汉，在周恩来、郭沫若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。1938年冬，武汉吃紧，王鲁彦带着爱人和孩子，随三厅经湖南长沙，辗转到了桂林。王鲁彦负责文艺界的组织工作，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的筹备活动，以后又被选为历届文协桂林分会的理事和常务理事。1940年春天，他转到当时的桂林中学教语文，同时在文化供应社任编辑，同邵荃麟、宋云彬等一道，为桂林的出版事业付出辛勤劳动。

1941年初，“皖南事变”发生，政治形势起了很大变化，桂林的文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。1942年1月，王鲁彦为了改变这种现状，在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，抱病创办了一份大型文艺月刊《文艺杂志》。

王鲁彦创办《文艺杂志》，希望通过此把文学和艺术工作者团结起来，服务民族解放斗争。他在1942年2月代表杂志编辑部写的《给读者》一文写道：“抗战以来，我们文艺工作者和千千万万的同胞在一起，无论在前方后方，都受着敌人大炮飞机的威胁。在这样不宁静的生活中，我们不但没有畏缩，却愈加勤奋，只想以国民的身份，多对国家尽一点责任，有助于抗战，多用自己的笔，忠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——这种种，我们这个杂志就是最好的明证。”

《文艺杂志》是怎样抗战的？

首先它发表了不少好文章。《故乡》是艾芜在抗战时期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。这部小说展现了抗战时期大后方国统区人民的真实生活，触及大后方社会生活的各种现实问题，揭示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人们的心灵世界。而这部作品就是首先在《文艺杂志》上发表问世的。除此，还有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《科尔沁草原》、张天翼的长篇童话《金鸭帝国》等都是《文艺杂志》首发。其次，《文艺杂志》刊登的很多作品都宣扬抗战到底，要求民主和自由，并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。《文艺杂志》得到文艺界的名家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张天翼、艾芜、端木蕻良、靳以、曹靖华、黄药眠、李健吾、王西彦等人的支持。

在桂林期间王鲁彦身体患病，《文艺杂志》的出刊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从约稿到编辑，以至出版、发行，几乎全都压到王鲁彦的肩头，过度的劳累使他身上的病加重。王鲁彦几次住进医院，先后4次开刀，他不忍刚刚办起来的杂志夭折，尽管卧病在床，仍坚持编辑刊物，有几期几乎是在病床上编成的。当时，他的唯一助手就是她的夫人覃英。因此，除了1—4期还能勉强按时出版外，自一卷5期起，晚出就是经常的事了。王鲁彦原先还有一个宏大的计划，准备把杂志社扩大为出版社，还准备编印一套文艺丛书，由于身体的病情，结果事与愿违。1943年初，王鲁彦病情日趋严重，经常咳嗽，喉咙痛，嗓子嘶哑，每到夜间还发烧，连说话也感到很困难，经医生确诊为肺结核。喉头结核，遵医嘱不得不停止一切工作，静心休养。刊物暂时由王西彦来帮忙编辑，继续出版。可那时王西彦也由于生活难于维持，不久又另谋职业去了。

在桂林的文学创作——
揭露现实不粉饰太平

王鲁彦在桂林期间除了创办《文艺杂志》，也坚持写作。

他的小说主要是短篇，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《柚子》《黄金》等，30年代写有长篇小说《野火》以及《童年的悲哀》《小小的心》《屋顶下》《河边》《伤兵旅馆》和《我们的喇叭》等。

早在1928年茅盾就发表过一篇《王鲁彦论》，这篇文章是针对当时王鲁彦的《柚子》集11篇与《黄金》《毒药》等而写的评论。茅盾说，自然和朴素是王鲁彦“卓特的面目”，茅盾认为他写的故事“就好像倾听民间故事，好像它们从老妪嘴里吐出来的一样自然而朴素”。

关于作品的朴素和自然，王鲁彦自己是意识到的。在《我怎样创作》一文中，王鲁彦对“《柚子》时期的作品有过中肯的自我评价：《柚子》是我的处女作，写那些文章的时候，我的年纪还轻，所以特别来得热情，呼号、咒诅与讥嘲常常流露出来。……幼稚，没有技巧，不成为小说。但是可爱的地方也就在这里，不能当它们为小说看，却能当我的年轻时代的生命的反映看。在那里，有天真的孩子气，纯洁的灵魂与热烈的情感。文笔是直率的，有时也有一点诗似的美句。”这一自评，触及作品的风格与特色，与茅盾的评点一致。质朴在王鲁彦早期的作品中已露端倪，在以后的作品中日益成熟，质朴贯穿在王鲁彦的全部作品中。

王鲁彦在桂林将近5年，虽然经常为病魔所缠，处境又十分窘迫，但他仍然坚持写作。最初计划写作的3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的第二部《春草》（第一部《野火》、第三部《疾风》），从1939年底起在桂林《广西日报》的《滴水》副刊上开始连载，到1940年2月止，只发表到第7章。短篇小说有《我们的喇叭》《炮火下的孩子》《樱花时节》《伤兵旅馆》《杨连付》《陈老妈》和《千家村》等，几乎都是从各种角度来描写与抗战有关的题材的。从这些作品中，能读到那个时代的社会百态，对于经历过的人们来说可能是记忆里的情结、家乡的样子，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，便能在阅读中看到历史的一面。例如，《千家村》写于1943年，发表在《文艺杂志》第二卷第四期上面，是计划中《疾风》的开端，可《千家村》竟成了他最后的一篇小说。号称“千家”的村庄经过洗劫后，剩下的农家已不足百户。但是，全村人民依然在血泊中挺起腰杆，开始有组织地抗日。作品像是篇纪实的散文，如实记录“我”的所见所用，现实主义的力量自然地从中溢出。

王鲁彦在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的创作，大部分是切切实实地反映生活、揭露现实，不去粉饰太平，也不做不切实际的幻想。这其实也是他受环境影响，文风所发生的转变。此前提到，茅盾的《王鲁彦论》一文中，茅盾曾指出一些作品思想虽美，却是思想概念的图解或说教，实为作家对现实人生所持的态度。“小说就是小说，不是一篇‘宣传大纲’，所以太浓重的教训主义的色彩，常常会无例外地成了一篇小说的 menace 或累赘。”茅盾指出，王鲁彦热情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见解，抒发自己的憎恶、愤慨或同情，但他也是采取特别地说出的手法，而未能从形象中体现，作品忽视审美功能，要求作家尊重文艺的本身规律。王鲁彦在桂林期间的写作便呈现出了这种转变。

此外，王鲁彦还写有《给读者》、《我们的喇叭》后记、《火的记忆》和《新的枝叶》等随笔、散文之类的短文，虽时光流逝，仍然受到读者的喜爱。

一名不懈的战士长眠于桂林——
亲人和友人的爱不曾缺席

王鲁彦逝世时年仅43岁，生命最后时光是在桂林度过的。他离开人世时还太年轻，但他生命的旅程中来自亲人的爱和朋友的爱却是满满的。

1938年，王鲁彦携家人踏上桂林这片土地。1940年秋，恶疾来袭，恶性疟疾迫使他放下手中笔杆，在医院与病魔抗争数月。出院后，应柳州师范之邀，举家前往柳州。然而，异地水土不服，疾病缠身，1941年7月，他们又回到桂林，栖身东江福隆街简陋木屋。他一面养病，一面从事写作。病重期间，艾芜，还有邵荃麟等都给予他关照。

王鲁彦由于连年多病，无法工作，他的爱人覃英于1943年冬又接受了湖南茶陵某中学的聘请，遂同覃英一道离桂去了茶陵。刚到茶陵不久，由于旅途劳累，王鲁彦肺结核病加剧，只得转往衡阳就医。他们没钱治病，甚至没有钱维持最起码的生活。困境中，田汉联合桂林文艺界柳亚子、熊佛西、端木蕻良等发起募捐，筹集医药费用，以救眉急，李济深慷慨解囊，捐赠5000元，虽暂解燃眉之急，却难驱病魔阴霾。

1944年夏，敌人侵占了茶陵，衡阳吃紧，王鲁彦于7月初又由衡阳回到了桂林，湘桂大撤退的艰难超乎想象，十多日的车程，四天四夜敞篷车上的风餐露宿，让本就虚弱的他病情雪上加霜，人也瘦得不成样子了。到达桂林后，已是囊空如洗，十分狼狈。在文艺界朋友们的帮助下，筹集到了两万元，接着又得到“文协”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的救济，才把他送进了桂林疗养院。到了8月中旬，病势突然恶化，经常处于昏迷状态，身体只剩皮包骨头。由于久病缠身，心力已经严重衰竭，虽经朋友们的大力支援，医生多方抢救无效，1944年8月20日逝世。

王鲁彦逝世以后，“文协”总会拨来了治丧费，在邵荃麟等的主持下，于22日出殡，葬于桂林星子岩之阳。消息传来，文艺界的进步人士和一些进步读者，都感到无限的悲痛和悼惜。在他逝世后的第10天，桂林文艺界举行了追悼会，参加的达200多人，由欧阳予倩主持，邵荃麟代表全国文协致了悼词。事后，邵荃麟、巴金、艾芜、王西彦、傅彬然等文化界朋友都发表了悼念文章。桂林文协同仁在《悼王鲁彦先生》一文中这样指出：“比什么都有更为基本，鲁彦先生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。因为善良，所以爱人；因为正直，所以敢于正视现实。……鲁彦先生，终他的一生，始终具有那种强烈的正义感，那种疾恶如仇的灼热心肠，无论如何，这一点却保证了作为一位作家的战斗事业的继续，直至最后。他不仅是一位清醒的作家，而且还是一名不懈的战士。”

图①：王鲁彦

图②③：《文艺杂志》

(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)